

杜牧论稿

吴在庆 著

● NANQIANG

CONGSHU

● XIAMEN DAXUE

CHUBANSHE

南

书

“南强”丛书
杜 牧 论 稿
吴在庆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0.375印张 4插页 250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615—0348—2/I·21

定价:5.50元

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郑学檬

副主任： 周绍民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天择 陈永山 周勇胜

赵 民 钟同德 张鸿斌

曾 定

“南强丛书”序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4月6日创办的,到明年将有70年的历史。为了庆贺这个光辉节日,在海内外校友的倡导和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南强丛书”。

厦门大学创办伊始,就明确宣告:“本大学之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合贯通,成为一种完善之文化。”厦大校歌则反复咏唱:“吁嗟乎南方之强”。几十年来,厦门大学师生弘扬“南强”精神,为实现自己的办学宗旨和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和贡献,培养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专家,编写出版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教材和学术专著,丰富了我国文化宝库。特别是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厦门大学满园春色,欣欣向荣,人才辈出,成果丰盈。以历史的眼光,选萃集成我校学者专家的优秀之作,出版一套以

教材、专著为主的“南强丛书”，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积累工作，也是对建校 70 周年大庆的最好纪念。

“南强丛书”的出版，是我校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首次征稿，各系、所踊跃推荐，参评的优秀书稿达 50 多部。经“南强丛书”编审委员会认真评选，首批入选的书稿有 15 部。这些著作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主要学科，都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既有久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花了心血的力作，又有后起之秀富有开拓性的佳作，还有已故著名教授的遗作。虽然数量有限，门类不全，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可以体现我校的教学、科研特色和学术水平。

出版“南强丛书”，是一项长期性的重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密切合作。今后，我们将根据本丛书的出版宗旨和具体条件，成熟一批，出版一批，以求更全面更系统地展示我

校教学、科研的丰硕成果。

由于时间匆促和我们的水平有限,评选工作和编辑出版工作遗漏、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希望校友和作者、读者给予指正。

最后,我们谨向资助出版本丛书的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前理事长黄克立先生致以衷心感谢!

厦 门 大 学 副 校 长 郑学稼
“南强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1990年9月15日

周 序

孟轲氏有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此知人论世之旨也。则论世不可以不知人，年谱、编年、辨伪诸考订，亦知人之一助也。

夫考订之学，其蒐集资料也宜全，其甄别史实也宜审。非勤奋不能致全，非心细难臻精审。故急功近利者不屑为，心气浮躁者不能为。在庆治《樊川文集》有年，于牧之生平创作之考订，继前辈学者之后，拾遗补阙，所获颇丰，吾固知其用心之勤且细也。

严沧浪曾言：“诗道本正大”。窃以为治诗之道亦然。在庆治唐诗有年，语不妄发，其于道也亦可谓正矣。然于大恐有未尽然者，以其知人之论多而论世之言寡也。于孟轲氏之言犹或未达一间。在庆其以为然乎否耶？

君述周祖谟

1991年元月23日序于鼓浪屿寓所

傳 序

我认识吴在庆同志是因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教授的推荐和介绍。祖谟兄是我的学长,1951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他正好清华研究生毕业,由于时间短,年纪相差不少,所以在学校中我和他除了他临毕业时全系合影曾一起聚会以外,并无交往。从清华出来,他一直执教于厦大,我则由清华转入北大,北大毕业后曾经短暂留校做了几年助教,嗣后即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地限南北,而又行业相隔,因此就更无往来。不过我仍记得30年前读过他写的一本《隋唐五代文学史》,字数虽不多,议论在当时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新异之处,却是建国以来较早的一本唐文学通史。大约5年前,偶然有一个机会我重读其中的几章,觉得平实的文笔时时触发引人思考的见解,有些在最近10年才提出讨论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已经注意到,只不过限于体例和篇幅,并未充分展开罢了。近10年来,祖谟兄与我都在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活动,有时每年,有时隔年,都要在一起开会。这些年来他在唐文学研究中当然又作出很多新的贡献,但他第一本书给我的印象却一直未能忘怀,我觉得它很象祖谟兄为人的风格,平实而不乏新见,简略而通达大局。与祖谟兄相处,会有一种厚实的感觉,使人很安心。他的那种淡泊于名利、超然于奔趋的心境是为友朋所心许默识的。

在庆同志是他的研究生,8年前由祖谟兄介绍,我评阅过他所

作的杜牧研究的硕士论文,后来即渐渐有文字来往。1982年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由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与我负责编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我约请祖谟兄撰写中晚唐研究情况的文稿,祖谟兄即推荐在庆同志与他合写,共同署名。第二期起,我征得祖谟兄同意,约在庆同志执笔撰写中晚唐或晚唐研究情况的综述。从那时起在庆同志已有关于杜牧及其他中晚唐作家的考论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所写的综述,则总是详细介绍别人的文章,很少提到自己,有时提到,也是十分简略而极为客观地一笔带过。倒是已故的吴汝煜同志在论述1987年的中唐文学研究时,特别提到:“在刘禹锡的考证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吴在庆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作者立足于本证,从刘禹锡诗文中钩稽史料,在有关刘禹锡的事迹、诗文系年等方面纠正了《刘禹锡年谱》的一些疏失;又为十四首诗歌作了新的系年。文章思虑周密,征引赅博,结论可信。”汝煜同志对刘禹锡诗文的考订也是下过很深功夫的。他为人朴质,不尚虚誉,因此他对在庆同志的文章评价为“思虑周密,征引赅博”,我认为其结论也是可信的。

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科学基础的是缪钺先生。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近10年来,在缪钺先生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对杜牧作了新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杜牧诗文的辨伪和系年问题,收获更大。就我的浏览所及,如吴企明、张金海、郭文镐、胡可先、王西平及吴在庆同志,他们这方面的成绩都很突出。除了吴企明同志年岁稍大一些,其他几位多是40岁上下,胡可先同志则更小一些,使人感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力量的雄厚。他们几位的文风稍有不同,有的平稳些,有的大胆些,彼此也都有所争论,但我看在庆同志的文章往往能折冲其间,摘取诸家之所长,而加以充实和提高。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

他在《杜牧诗文系年及行踪辨补》一文中，考证杜牧出守黄州的时间，缪钺先生的《年谱》曾辨杜牧文集《上宰相求湖州启》所记月份之误，在庆同志又论述《年谱》此一推算稍有误差，并从而认为杜牧出守黄州在会昌二年三、四月间。在此处，他特别加括号注明：“此点郭文镐君致笔者信中首先指出。”对私人通信中他人的论点，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加以引用，并表明这一论点的提出乃在写作者本人之先，这种学术上的勇气和度量实在是非常值得称道，非常令人钦佩的。

我觉得，在庆同志的学风和文风，与祖谥兄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上面提到的，只是几个例子。这些年来，我因为与祖谥兄在工作上和学术上联系较多，从而也与在庆同志接触多了起来。他们都使我领悟到一种令人怀念和珍惜的交友之道。现在，在庆同志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杜牧的论文结集成书出版，要我为他的这本专著写一篇序。想起我与祖谥兄结识近40年来的交往，看到他们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分别作出的业绩，以及表现出来的颇相仿佛的风尚，我觉得应该写出我的一点感受，并借以表明在我们学术界确有一种正气存在，这种正气的意义是远远超出于学者们取得的具体成果的。

我认为，在作家作品的考订方面，中晚唐的难度实大于初盛唐；晚唐与中唐比较，晚唐的难度更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史料的复杂。晚唐的史料并不缺乏，但却真伪混杂，作家之间的事迹材料又彼此纠缠。以杜牧来说，他的文集除了其甥裴延翰所编的二十卷本《樊川文集》以外，宋以后出现了好几种续编，如《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诗补遗》、《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等等。但这些别集、外集、补遗、补录，却数量不等地混入他人之作。南宋诗人兼诗评家刘克庄，在其所著诗话中就说过：“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是许浑诗。”他说这些补编之中，十有八九是许浑的诗，可能有

所夸大,但现存杜牧集子中掺杂许浑之作,经学者们的考索,数量确实不少。要辨析哪些是杜牧诗,哪些是许浑的诗,必须考明两人的生平,而问题在于许浑的事迹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近些年来,研究杜牧往往同时也研究许浑(譬如我知道郭文韬同志已写了几篇许浑的考证文章,有的他特意寄给我看,我对他的用心之细是很佩服的。文韬同志这些年来也一直在出版社工作,编务极忙,但他并不放松研究,相反,他还因编辑工作之便结识了好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形,真正要弄清晚唐作家的事迹或作品的真伪,就要牵涉到另一个作家,则不得不先把第一个作家暂时放下,研究这第二个;而深入到第二个,则又碰到与另一个作家又有纠结,则势必又要去翻检那第三个的材料,并加以印证这第三个材料的确实性。这样,摊子就越铺越大,使人有治丝益紊之感。另一方面,晚唐的历史材料本身又极复杂,如唐代武宗的实录大部分佚失,宣宗以下的实录并未修成,这样,史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即残缺不全,修史者又不分大小巨细,也无心顾及真假。对此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评及《旧唐书》时就作过分析,而唐史学界长时期来对晚唐史料缺乏整理,这方面的工作往往被迫由治文学史者来担任。这就更增加对晚唐作家作品考订的工作量,也使得表面看来作出的成绩不如初盛唐。而实际上,就我个人所见到的,唐诗学界对晚唐的考证,所下的功夫是很深的,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实在的。除杜牧外,象对李商隐、温庭筠、许浑、张祜、韩偓、韦庄、罗隐等,都有极为丰硕的创获,它们有的已超出文学史的范围,对唐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助益。

当然,放在在庆同志这本书中的,还有好几篇理论上的阐发,如论杜牧的思想、杜牧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杜牧对后世的影响,等等,多有很好的见解,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但是,我认为,构成本书基础的,也是构成在庆同志中晚唐文学研究基础的,

是他对作家事迹的考证，他对作品的系年及真伪的辨析。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应当先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但却往往为人所忽视，或为人所鄙薄。笔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论这10年来文史学界的考据的。文章口气很大，说：“历史似乎注定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考据家不能有多大的作为”，因为据说他们只是“消极地考证和确认一些支离破碎的事实”，他们“漫无目的和方向，但事考证，不问其他，鄙视历史理论的建构，纯粹的为考证史料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因此，文章判定，这样的研究“既没有社会意义，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我不大清楚，这个我们共同经历过的80年代有没有产生过“风靡一时的考据家”，这些考据家有哪些考据文章或专书，他们又是如何的“漫无目的和方向”。据我看来，不论整个唐代文学，或晚唐文学，关于作家作品的考证，成绩是显著的，目的和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为整个唐代或晚唐文学的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依据，使文学史的理论探讨有坚实的科学凭依。考证如何为理论提供事实的支撑，理论如何在考证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我认为在庆同志的这本书是能够作出回答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界确实需要这样踏踏实实的著作，而切不要放言高论而远离实际。

傅璇琮

1990年9月于北京

引 言

唐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上自帝王后妃，中如学士郡守，下至贫寒士子、山野僧道樵夫，人们都以诗歌诉说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抒发着理想与愿望。要了解这个时代，无论是它的历史、政治，还是哲学、经济、艺术等等方面，不深入研究这一时代的诗歌，那将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是肤浅的。因此，历代的许多学者都极为注重对唐诗的研究，从中吸取营养，为创造繁荣他们那一时代的文化作出贡献。

前人在唐诗乃至唐代的文化研究上已做了不少工作，遗留给我们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以及学术成果，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但是，我们在自豪之余，更重要的是利用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之资，从而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以此为我们的时代奉献绵薄之力。这就是今日我们的唐诗研究者们所正在努力的，也是笔者之所以乐于“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地对唐代文学进行研究的缘由。

学术研究最忌因袭陈说、拾人牙慧，而应追求新的发现与突破，尤贵于在人所罕道或争论纷纭的问题上，或独辟蹊径，或据可靠资料，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宋人姜夔曾云：“人所易言，我寡言

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① 我以为这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在著书立说时所应该遵循的；这也是我在杜牧及唐代文学的研究上所时时用以自砺的。这本《杜牧论稿》之所以以现在这样的内容与形式出现，而不作面面俱到的叙说评述，其用心就在于此。

如前所说，前人在唐诗学上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作出了他们那一时代所能作的贡献。但是，在如繁星丽天的诗国天空中，前人以至今人所研究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仅集中于诗国的双星座李白与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等等大家名家上。因此，我们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仍然很多。杜牧就是其中之一。杜牧向与李商隐合称“小李杜”，可称为唐诗名家。对他的研究，比起众多的中小诗人来说，还算是为不少研究者所注目的。但比起大李杜，比起李商隐诸人，则仍然还是较寂寞的。当然，前人对杜牧的才具是颇为推崇的。清人翁方纲就激赏云：“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后，未见其比。其笔力回斡处，亦与王龙标、李东川相视而笑。‘少陵无人谪仙死’，竟不意又见此人。”又谓其佳作“直自开宝以后百余年无人能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后，亦更不能道矣。此真悟彻汉、魏、六朝之底蕴者也。”^② 明人胡震亨亦称“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画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自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③ 然而尽管前人激赏称誉如此，他们对杜牧的研究除了清人冯集梧耗费心血为作《樊川诗集注》外，大多仅停留于评点式的议论上，而未能作出更全面 深入的研究，以此杜牧的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的推进、发展。

① 《白石诗话》。

② 《石洲诗话》卷二。

③ 《唐诗谈丛》。

应该说,杜牧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深入与突破,是从著名历史学家、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开始的。他所著的《杜牧年谱》、《杜牧传》,不仅基本理清了杜牧的生平行踪,为不少诗文作了精确的系年,廓清了一些历代相传的讹传与谬误,而且对杜牧的身世思想及诗文艺术风格均有简约精到的发明,为此后杜牧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推动了杜牧的研究工作。

当然,限于成书体例以及另有诸多研究项目,缪钺教授无暇对杜牧的各个方面作出全面的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是要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因此,无论是在前人遗留的杜牧研究资料及成果上,还是在诗人的生平行踪、诗文系年、辨伪上,或是在杜牧的思想、艺术以及人际交往、党派纷争、文坛论争等等方面,都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进一步研究澄清或加以补充分析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不少杜牧的研究者都分别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近10年来,杜牧的研究确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取得的成果已为学术界所瞩目。

笔者对杜牧的10年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必须在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有所补充与开拓,而没有必要为求全面周详,用另一种形式过多地重复已取得的成果。这也就决定了我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从而也就决定了我这本研究专著的内容与框架。这本书所做的仅是在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作补阙与拾遗;或纠正讹误、廓清疑惑;或考索探赜,为诗文辨伪系年;或对历代争论纷纭之问题,乃至几成定论之看法,援据可信的资料,揆之以情理,为进一解。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些开拓的努力。归纳全书,其所考索研究的问题有如下五个部分:一、杜牧疑伪诗甄辨;二、生平行踪、作品系年及其诗考论;三、政治思想、党派分野及其对创作之影响;四、诗文的渊源及艺术

风格、表现手法；五、文学思想及影响。这五大部分，从它所涉及的问题上看，可以说基本上已包括了作家论所应涉及的各个方面，所以尚可称自成系统。但是，应该说每一个方面都还不是全面而周详的，我在各部分所要考索研究的，仅是那一部分所存在的问题与争论，或是在人们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上，尚可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总之，尽可能说自己的话，阐述自己以为尚有新意的观点，力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因此，有的部分可能详细些，而有的部分则较为简略。

基于上述原因，各部分的论述中，难免对某些问题的提出与论述缺少来龙去脉的说明，因而可能会产生突兀之感。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各部分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杜牧的研究情况做一个简略的介绍说明。

据杜牧的外甥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说，杜牧平生所作诗文，都寄给裴延翰。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冬，杜牧自湖州刺史入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修创樊川别墅时，就嘱裴延翰将来为他辑集诗文成集，可号为《樊川集》。大中六年冬，杜牧生病时，又“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然而裴延翰所藏蓄者，“比较焚外，十多七八。”于是在杜牧卒后不久，裴延翰就遵嘱将杜牧的“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这一文集的诗文是最为可靠的。然而自宋以后，又有《樊川诗补遗》、《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遗收诗补录》等诗集出现。这些后人辑成的集子，混有不少赝品，自宋代起即有人提出怀疑，指出其伪。但辨伪工作的深入进行还是十年来的事。其中，吴企明先生和其他同志甄辨出了好些《樊川文集》外的所谓杜牧诗实为赝品，然而尚待甄辨的所谓杜牧诗仍然不少。如不尽可能地辨别清楚这些诗作，对杜牧的某些研究就可能有建立在沙滩上的危险。比如《清明》一诗的真伪问题，学术界至今尚

未有统一的看法,如果据以研究杜牧,就可能有失真之虞。因此,笔者以为甄辨疑伪诗的工作是研究者的要务,势在必行。于是在学术界所取得的辨伪成果上,我遂又有《杜牧疑伪诗考辨》之作,甄辨出《过鲍溶宅有感》等二十余首诗及散见于诗话笔记中的一些实非杜牧作的诗作。此外,在这一部分中,还就童养年先生补录进《全唐诗外编》中的所谓《全唐诗》遗收杜牧诗进行查核,发现其所补录者几乎全见于《全唐诗》中。另外,被人认为是酬杜牧的薛涛《酬杜舍人》诗,经考察,我认为实与杜牧无涉。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杜牧的生平行踪、诗文系年的研究,它多以考辨的形式出现。应该说,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杜牧传》已基本解决了杜牧的生平行踪及其诗文的系年。不过,学术界对于缪钺先生所考定的杜牧卒于大中六年(852年)之说尚未完全接受,并有人提出杜牧卒于大中十一年七月之后的新说。笔者认为,新说据以立论的几条证据,或是史载本身有误,或对史料的理解有所偏颇,都是不足为据的。为了使缪钺先生的杜牧卒于大中六年说不致为新说所困惑,我遂有杜牧卒年的研究。除了以史实辨明新说之误外,又以新的材料,证明了杜牧的确卒于大中六年冬,并进一步得出杜牧卒于大中六年十二月的结论,若以新历纪年,他卒时实已跨入新年,卒年应该是公元853年。对杜牧诗文的系年及行踪的研究,是杜牧的研究者们所极为关注的问题。在缪钺先生所作出的成果之后,依然留存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应该说缪钺先生未系年的诗文其难度是较大的。这就需要研究者作更深入细致,更为艰苦的研究考索。其中有些作品因未搞清以官名称谓出现的人究竟是谁而难于系年,而有些则因背景、事件以及地点等原因而不易确定作年。笔者查出了一些以官名称谓出现的人名,考定了部分诗文的作年。而由于系年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也由此对杜牧的行踪有了新的发现与补充。如文宗开成三年夏,杜牧曾与诗人孟迟会于